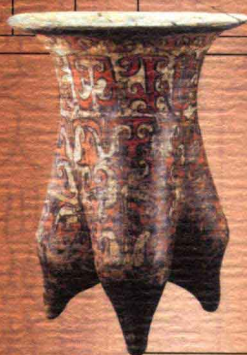


史著英华

主編／張永桃 本卷主編／魏良弢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第六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漢護軍

憲議奏於衆議

高祖荀悅曰韓非字李邦之字
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
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曰沛縣也豐其鄉也之東曰後沛
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也
祖所生故舉其本縣以爲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14

主编 / 张永桃 本卷主编 / 魏良弢

史著英华

第六卷

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保顶 李天石 李昌宪 李崇新

张金铤 高荣盛 钱国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后汉书》评介	(1)
一、作者及成书情况	(1)
(一)世代为官	(1)
(二)恃才傲物与宣城之贬	(3)
(三)谋逆之诛	(6)
(四)《后汉书》的补作、注释及版本	(9)
二、《后汉书》内容	(13)
(一)《后汉书》的结构及体例特点	(13)
(二)正一代之得失	(27)
(三)贵德义与薄公卿	(46)
(四)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62)
三、《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70)
《三国志》评介	(77)
一、作者及成书过程	(78)
(一)陈寿与《三国志》的著述	(78)
(二)《三国志》的注释及版本	(82)
二、《三国志》内容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85)
(一)体例及结构	(85)



(二)《三国志》的思想	(95)
(三)《三国志》的文笔	(97)
(四)别具一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	(102)
(五)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119)
三、《三国志》的评价	(125)

《资治通鉴》评介 (132)

一、作者生平及《资治通鉴》的成书	(133)
(一)好学、诚朴的少年	(133)
(二)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136)
(三)《资治通鉴》编纂的酝酿	(140)
(四)《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	(142)
(五)司马光的助手们	(145)
(六)《资治通鉴》的编写程序	(149)
(七)《资治通鉴》的版本	(150)
(八)《资治通鉴》的派生书	(152)
二、《资治通鉴》的基本内容	(155)
(一)简明翔实的政治史	(155)
(二)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教科书	(170)
三、《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和通鉴学	(182)

《通典》评介 (189)

一、杜佑的生平及《通典》的编撰	(190)
(一)杜佑的生平	(190)
(二)《通典》的编撰	(194)
二、《通典》的主要内容及编撰方法	(198)
(一)《通典》的主要内容	(198)



(二)编撰方法	(201)
三、《通典》的价值和影响	(204)
(一)《通典》的史学价值	(204)
(二)进步的历史观	(213)
(三)《通典》的影响及研究	(224)
《通志》评介	(232)
一、郑樵的生平与《通志》的编撰	(233)
(一)郑樵的生平	(233)
(二)《通志》的编撰	(234)
二、《通志》的主要内容及编撰特点	(238)
(一)主要内容	(238)
(二)编撰特点	(242)
三、《通志》的评价及版本	(258)
(一)《通志》的史学思想	(258)
(二)《通志》的价值	(265)
(三)《通志》的版本	(267)
《文献通考》评介	(270)
一、马端临的生平及《文献通考》的撰著	(271)
(一)马端临的生平	(271)
(二)《文献通考》的撰著	(273)
二、《文献通考》的主要内容及编纂特点	(276)
(一)主要内容	(276)
(二)编纂特点	(280)
三、《文献通考》的评价与版本	(288)
(一)《文献通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288)



(二)《文献通考》的思想价值	(292)
(三)《文献通考》的影响	(307)
(四)《文献通考》的版本	(309)



《后汉书》评介

后汉,相对于刘邦建立的前汉而言,都城洛阳,在前汉都城长安的东面,故又称东汉,前汉称西汉。后汉包括公元25年刘秀称帝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共196年的历史,南朝宋人范曄撰著的《后汉书》就是记载后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一、作者及成书情况

(一)世代为官

《后汉书》的作者范曄,字蔚宗,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出生在一个世代显贵的官宦门第。其五世祖范晷,字彦长,在西晋官历上谷(今河南怀来)太守,加封左将军。范晷有二子,长子范广官堂邑(今江苏六合)令,次子范稚即范曄高祖曾任大将军掾。范稚之子范汪,任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范曄祖父范宁,字武子,博览群书,以经术见称于当世,任余杭(今浙江余杭)令、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等职。

范氏家族的显贵到范曄之父范泰时达到顶点。范泰,字伯伦,东晋时为太学博士,博学多才,曾任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二府参军,迁中书侍郎,袭爵遂乡侯。桓玄专权时,范泰一度受到排挤,官位被罢,不得不离开京师,携家眷徙居丹徒(今江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史著英华

苏镇江丹徒镇)。不久,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进攻建康,翦灭桓玄,晋安帝复位,刘裕执掌东晋政权,范泰得以入朝任黄门侍郎、御史中丞。

东晋末年,政治黑暗,南渡后的世家大族在江南地区敲诈盘剥,求田问舍,圈山占水,奢靡腐朽,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揭竿而起,孙恩、卢循在东南沿海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东晋王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率兵镇压,时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的范泰发兵千人壮其军威,并为刘裕提供大量粮饷,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范泰投靠刘裕并非一时冲动,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目光。刘裕是正在崛起的寒门势力的代表人物,拥有重兵,得天下指日可待。这样,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范泰与刘裕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刘裕对他也特别器重与赏识,加封振武将军,次年升侍中,不久转任度支尚书;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为大司马长史、右卫将军,位至三公。公元420年,刘裕正式代晋建宋,是为宋武帝,封范泰为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宋政权开办国学,任范泰为国子祭酒,范泰时年已67岁。范泰长于经学,颇染魏晋士人的豪爽放达之风,不拘礼节,刘裕以故人相待,从不计较。范泰患有足疾,行动不便,刘裕竟允许他乘辇上朝。在文帝刘义隆时期,这位开国重臣每逢朝廷聚会,仍“乘辇到坐”^①,发表政见。元嘉五年(公元428年),范泰病故,享年74岁,被迫赠车骑将军、侍中、特进,生前备享尊贵,死后极尽哀荣。曾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范泰有五子:长子范昂,幼年夭折;次子范髦,官至宜都(今湖北宜都)太守;三子范晏,任侍中、光禄大夫;四子范晔;少子范广渊,曾为世祖抚军谘议参军。除长子早夭外,其余四子都在刘宋政权中任职。

^① 《宋书·范泰传》。



(二)恃才傲物与宣城之贬

范晔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自幼过继给伯父范弘之,袭武兴县五等侯。受家风熏陶,且天赋极高,“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①,由是年少即负盛名。17岁时,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刺史鲁宗元请他去做州主簿,范晔未就职。其父范泰与刘裕关系日见密切,范晔投向刘裕第四子刘义康部下。刘裕代晋后,封义康为彭城(今江苏徐州)王,范晔任刘义康冠军参军,不久转任右军参军,后入朝补尚书兵外郎。

文帝刘义隆即位后,刘义康改任荆州刺史,范晔随之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朝廷征他为秘书丞。在他31岁时,父范泰去世,范晔以丁忧去职。两年后,到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部下为司马,领新蔡(治今河南新蔡)太守。檀道济是南朝著名将领,在对北朝战争中屡建功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北魏发兵南侵逼近滑台(今河南滑县),文帝加封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兵北伐,令范晔负责水路运送兵员及军械粮饷。檀道济击退北魏兵回师,不久遭谗被杀,范晔调任彭城王义康部下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迁任尚书吏部郎。

魏晋南朝时期,前代礼教的种种束缚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冲击得七零八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得到张扬,不拘礼节、豪爽放达、表现个性遂成为一时风尚,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范氏家族不免受到熏染,范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②。范晔深受家风的影响,鄙视权贵、菲薄公卿、恃才傲物、率性放达,构成了他的人生。

① 《宋书·范晔传》。

② 《宋书·范泰传》。



范晔善弹琵琶,并能谱写新曲,但他从不以此邀宠竞媚。文帝知道他的才能,朝会宴享之中屡次暗示他弹奏助兴,可范晔一再佯装不知,敷衍搪塞。一次朝廷宴会之上,文帝饮酒过量,情绪欢畅,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对范晔说“我欲歌,卿可弹”^①,要范晔为他伴奏,借着酒兴放声而歌。在这种情况下,范晔才不得已一露身手,但当文帝歌声停止,范晔立即止弦。

对文帝尚且如此,对公卿权贵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范晔凭卓异的才思曾作一篇奇文名《和香方》,借谈论各种香料、药物的性味特征,暗指当朝权贵,对权臣遍加讽刺,形象贴切,趣味盎然。文章说:“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又枣膏昏钝,甲煎浅欲。”^②“麝本多忌”影射侍中、吏部尚书庾炳之,据《宋书》本传记载,庾炳之素无学问,但精通权术,以致“内外归附,势倾朝野”。此人脾气暴躁,粗俗不堪,令人不解的是他还有“洁癖”,如有人到他家,客人尚未出门就令人“拭席洗床”。他大肆收受贿赂,后被人告发而罢官。麝香有兴奋作用,但使用不宜过量,“过分必害”,以此比喻庾炳之的性格及为人,颇为贴切。“零藿虚燥”指侍中何尚之,此人少时好斗鸡走狗,游玩博戏,后沉溺佛鬼,神秘莫测,以零藿的“虚燥”比喻他可谓恰如其分。“枣膏昏钝”指左卫将军、光禄大夫羊玄保,以枣膏的混沌粘稠状态比喻他的迂腐无能,中庸敷衍。“甲煎浅俗”指侍中、太子詹事徐湛之,他贪得无厌,穷奢极欲,“使乐之妙,冠绝一时”^③。三吴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千余人,臭味相投,成日跟从他的左右,装扮不伦不类,“资质端妍,衣服鲜丽”^④,浅薄低级,俗不可耐。“沉实易和”作者用以自比,说明他表里如一、超凡脱俗的品格。

① ② 《宋书·范晔传》。

③ ④ 《宋书·徐湛之传》。



封建社会的专制性质决定了扼杀人的主体性以服从于统治者意志的本质,即使在礼教束缚较为松弛的魏晋时代,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也是很有限度的,名士们虽然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自居,但无时不受到礼教罗网的羁绊,嵇康等名士大多未得善终的人生归宿就是最好的说明。范晔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他迟早要碰壁,并对他的人生归宿不能不产生影响。

果然在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范晔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挫折。这年冬天,彭城王刘义康的生母彭城太妃死,刘义康的僚属故旧皆前来参加葬礼,范晔当然也在其列。此时范晔的幼弟范广渊任司徒祭酒,当夜恰逢轮他值守。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二人宿于司徒府,酒瘾发作,于是二人开怀畅饮,饮到兴处,竟开窗听挽歌以助酒兴。此事迅即传到刘义康耳里,他大发雷霆,将范晔逐出建康,贬任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

宣城是一块富有灵气的地方,南朝诗人谢朓及唐代大诗人李白都在此留下了奇丽的诗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宣城之贬使范晔在宣城完成了足以让他名垂青史的《后汉书》的大部分写作。在太守任上,他郁郁不得志,于是“穷览旧籍,删烦补略”^①,“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②。《后汉书》的写作在被贬之年就开始了,但具体年代《宋书》记载前后不一,《范晔传》说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义康母死,范晔因失礼被贬。据此,修史应始于元嘉元年。但《刘义康传》说:“(元嘉)九年,(王)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其年太妃薨。”据此范晔被贬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修史也应始于同年。二说以何为是呢?《宋书·文帝纪》说王弘死在元嘉九年五月,与义康传相合,因此范晔被贬与修史以元嘉九年的可能性较大,是年他35岁。约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

① 《史通·正史篇》。

② 《宋书·范晔传》。



年)范晔由宣城太守调任文帝第二子刘浚的后军长史,领下邳(今江苏睢宁)太守,从此又在宦海浮沉。在宣城的近10年时间,是范晔著史的关键时期,这期间他完成了《后汉书》的大部分写作。

刘浚年幼,但肩负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的重责,日常事务由长史范晔办理,掌管军政大权。两年后,范晔升任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同掌禁军,参预机要,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范晔为太子詹事,次年以谋反罪被杀,死时年48岁。从宣城之贬到被害,《后汉书》写作前后历时15年,尚只完成纪、传部分,范晔带着《后汉书》未能终篇的千古遗恨匆匆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历程。

(三)谋逆之诛

范晔与刘义康的交往大约在他20岁左右就开始了。刘义康其人颇有才干,“纠剔是非,莫不精尽”^①,而且广纳贤才。范晔聪颖过人,加之他们父辈间的亲密交情,使范晔与刘义康之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范晔自投义康后,作为僚属一直跟随着他。义康任彭城王时,范晔任冠军参军、右军参军等职。义康任荆州刺史时,范晔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义康入朝任司徒,录尚书事,又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掌管朝政,范晔任其部下司徒从事中郎。元嘉九年的“挽歌事件”虽然引起义康的恼怒,范晔被逐出京师,二人关系一度蒙上阴影,但这个阴影很快被消除。范晔的外甥谢综任义康的大将军记室参军,义康特意让谢综向范晔转达捐弃前嫌、重修旧好之意,不仅使范晔消除了心中的不快,而且更加崇敬、信任义康。“士为知己者死”是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在人的主体性凸现的魏晋时代,这种信念益发变得强烈。

^① 《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刘义康的才干与参预朝政必然引起生性多疑的宋文帝的警惕,为避免尾大不掉,他于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将刘义康逐出建康,解除司徒之职,改授都督江、广、交三州诸军事,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这些都是当时的僻远蛮荒之地。刘义康的外放是其“谋反”的直接诱因,深受义康恩泽的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率先发难。

孔熙先素有大志,其父孔默之曾任广州刺史,在任期间因触犯刑律下狱,经刘义康斡旋幸免于祸,由是孔氏父子非常感激,常思报答。刘义康被贬黜,孔熙先自然心头不平,认为时机已到,但自己势单力薄,难成大事,于是想到与刘义康颇有交情的范晔。孔与范晔起初并无联系,他通过范晔外甥谢综的引荐而结识,并愈见亲密。交往到一定程度之后,孔熙先方才向范晔吐露心迹,希望范晔与他携手共辅义康。范晔开始并没有立即应承下来,经过孔熙先的一再申说,又有与刘义康的交往为基础,遂定下决心。参与此事的还有丹阳尹徐湛之、范晔外甥谢综等。

孔熙先与范晔定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九月的一天为举事日期,是日宋文帝在武帐冈为征北将军王义季、右将军王铄行出镇外地设宴饯行。孔、范拟在宴席上见机行事,但因没有机会未能得手,此事遂被耽搁下来。延至十一月,丹阳尹徐湛之贪生怕死,邀功请赏,将所谋之事向文帝和盘托出,于是孔熙先、范晔、谢综等被投进监狱。

范晔身陷囹圄自知无生还的可能,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即《狱中与诸甥侄书》,对自己的人生作了回顾总结,更主要的是对萦绕于心的《后汉书》的写作情况作了交待,是后人了解此书的重要材料。范晔对死看得十分平淡,狱中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说:“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表明他要同嵇康、夏侯玄一样面对死亡。嵇生即嵇康,善弹琴,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平静地弹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引颈就戮。夏侯即夏侯玄,拟谋杀司马师,事泄被



害,临刑时颜色不变,神态自若。范曄临刑时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将出市,曄最在前,于狱门顾谓(谢)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①一同被杀者有数十人。

对于范曄以谋逆罪被杀,后人颇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古代史家出于对《后汉书》的推崇和爱护,爱屋及乌,不愿意看到其作者背上谋反这样大逆不道的罪名,如清代学者王鸣盛、陈澧、李慈铭、傅维森等都极力为范曄开脱辩护,认为范曄之死是千古奇冤。

现代有些学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希图发现范曄谋立刘义康的“进步”性。其实,范曄参与谋立刘义康是无需否认的历史事实,连他自己也不隐讳,狱中写的家书首句即言“吾狂衅覆灭,岂可复言”^②,临刑前自称“贼帅”。文帝时毕竟尚属开国之初,社会政治尚且安定,文帝也并非桀、纣那样的无道君主,尽管刘义康富有才干,范曄谋立他为皇帝很难说有什么进步性,政治上动荡大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破坏。范曄之死一方面与他鄙视权贵、树敌过多有关,另一方面是他重视与刘义康的交情,而这两点正体现了魏晋时期人格的主体精神。不拘礼法,鄙视公卿,贵德重义,反映了个体的自觉,范曄之死毋宁说是魏晋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复归及凸现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史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史家个性的体现,《后汉书》中范曄对鄙视皇帝、菲薄公卿事例的记载,对东汉末党人勇斗权贵、视死如归的尽情描述,使我们能看到范曄的影子。

范曄毕生著述除《后汉书》外,还有《汉书赞》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百官阶次》一卷及诗赋等,这些著作惜皆散失,惟有《后汉书》彪炳千古,嘉惠史林。

^{①②} 《宋书·范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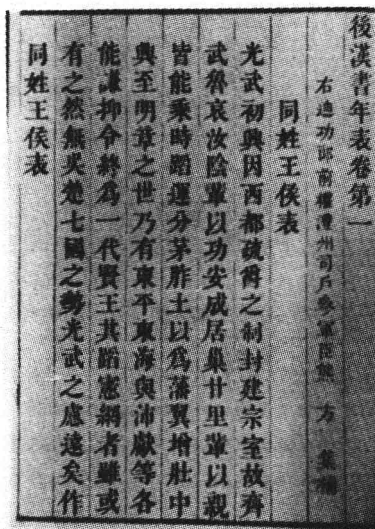


(四)《后汉书》的补作、注释及版本

范曄撰修东汉历史本打算写十纪、八十列传、十志，共百篇，但未及终篇即被杀，只成十纪及八十列传，缺少记载典章制度的志，留下千古之憾。后世学者为使《后汉书》成为完璧，进行了大量的补修工作。

最早为《后汉书》补志的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外兄。他为范曄书作注，因范曄生前曾称赞过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于是他将《续汉书》中的八志分三十卷补入范书之中，并为纪、传、志作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后汉书》的面貌。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初拜骑都尉，晋武帝时为秘书郎，转为丞。曾为《庄子》作注，著有《九州春秋》，卒于晋惠帝末年。司马彪《续汉书》的“志”也不全面，尤其缺少记载一代文献著述情况的《艺文志》，后人尤其是清人竞相补撰《艺文志》，著名的有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姚振宗的《后汉书艺文志》、顾怀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

范曄《后汉书》缺“表”。最早为《后汉书》补表的是宋人熊方，著《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广搜东汉一代史迹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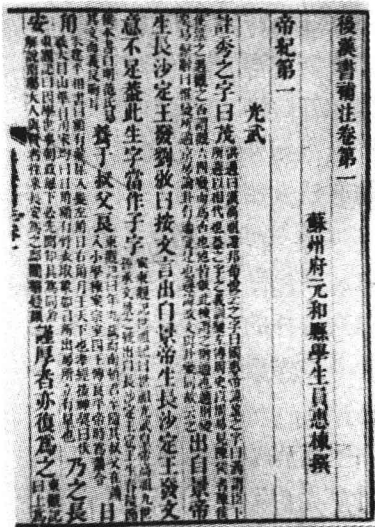
熊方《后汉书·年表》



以表谱形式编排起来,对了解后汉史实颇有价值,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评价甚高。熊方之后,补表者代有人出,尤以清人最有成就,著名者有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褚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练恕的《后汉六卿年表》、黄大华的《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及《东汉皇子王世系表》。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撰有《历代年表》,有关东汉者有《诸王世表》、《宦者侯表》、《外戚侯表》、《将相大臣年表》、《云台功臣年表》及《九卿年表》等。

《后汉书》未及成书作者便告别人世,使全书未能进行最后润色加工,文字、结构等方面不免有粗略疏漏之处,历代为其作注者不乏其人。最早为范书作注的是刘昭,刘昭注不仅限于文字的训诂,而且注意补充史实,使刘注具有较高价值。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此即所谓李注。李贤为高宗第六子,本立为太子,但不久被武则天废为庶人,并被迫令自杀,卒年 33 岁,谥章怀太子。与李贤一同为《后汉书》作注的人,还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以及学士许成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前后历时六年。李注在名物、训诂方面颇有成就,又广泛引用《东观汉记》及谢承《后汉书》等东汉史文献,材料翔实。因参加人多,又未仔细校订,存在一些错误、冗杂和疏漏处。

清人对《后汉书》的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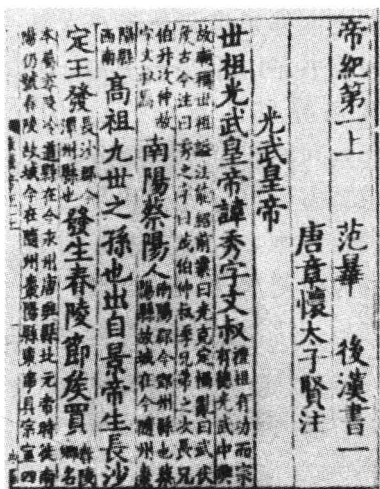


清惠栋《后汉书补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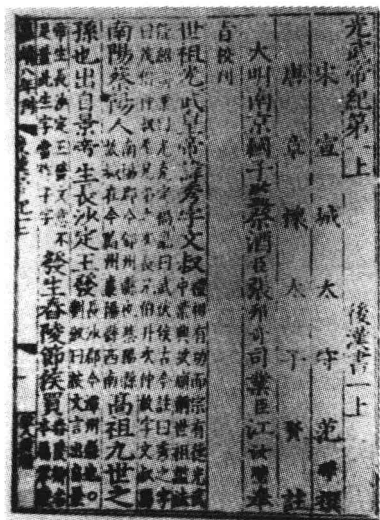


以惠栋的《后汉书补注》及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成就为高,后者尤为突出。如同王先谦所作的《汉书补注》一样,《后汉书集解》以同一体例网罗唐、宋以来诸家之说,翔实完备,为《后汉书》诸注中最佳者。除此之外,被称为清代三大考史著作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后汉书》的校补考订细致缜密,成就卓著。钱大昕的《后汉书辨疑》、周寿昌的《后汉书补正》、李慈铭的《后汉书札记》,都是考订《后汉书》的专门著作,在内容及文字方面对《后汉书》补益甚多,为后人提供了很大便利。

《后汉书》成书之后,以抄本流传于世,南朝梁将司马彪八志补入史书,出现两书的合抄本。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逐渐普及,为史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现实条件,但《后汉书》最初雕印本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 1005 年)的



宋绍兴本《后汉书》



明南監本《后汉书》